




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

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之 关联研究

郑日男 著



人民 出 版 社

 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

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之 关联研究

郑日男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侯俊智
装帧设计:语丝设计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之关联研究/郑日男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
(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01-010659-5

I. ①楚… II. ①郑… III. ①楚辞研究②古代文学研究—朝鲜
IV. ①I207.22②I31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7677 号

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之关联研究

CHUCI YU CHAOXIAN GUDAI WENXUE ZHI GUANLIAN YANJIU

郑日男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25
字数:300 千字

ISBN 978-7-01-010659-5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总 序

“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即将出版，作为延边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之一，这套丛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朝鲜—韩国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

延边大学是一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综合型大学，朝鲜—韩国语言文学学科自延边大学成立之初，担负起本科教学及科学研究的重任。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与发展，该学科已是延边大学的领头学科，1994年被评为吉林省重点学科，2002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随着中日、中韩建交，中国与韩国、朝鲜、日本等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迅速发展，国内外朝鲜—韩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优势日益明显，具体例证为延边大学“211工程”一期、二期、三期建设取得的研究成果。

季羨林先生曾提出“朝鲜—韩国学”是“研究与朝鲜半岛相关的各领域的学问，这是不仅包括地理、人种、语言等，还包含历史、文化、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是内涵非常丰富的一门学问”。

“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由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学语言文学学科几位教授和学者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选取精髓部分编撰而成。收录到该丛书中的五个研究成果中，四个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另外一个韩国韩国学研究中心项目，受到延边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的大力支持。

金永寿的《中国朝鲜语规范原则与规范细则研究》，以基本的语言规范化理论为基础，以科学性、政策性、稳妥性、经济性等语言规范化原则为指导方针，回顾中国朝鲜语规范化的历史，比较中国朝鲜语规范原则与朝鲜文化语、韩国语规范原则之间的异同，探讨了中世纪朝鲜语及现代朝鲜语语法术语的使用问题，该成果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规范化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金光洙的《中朝韩日英生物学术语对译词典》，调查和分析对应于英语的生物学用语的实际情况，试图摸索其规范化和标准化方案，构筑了英语—韩语—朝鲜语—汉语—日语生物学用语对译目录。该研究将对东北亚的生物学研究及生物学用语的规范化和普及，乃至其他科技术语的规范化、统一及普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金哲俊的《“类解”类文献中的汉—朝词汇研究》，以历史语言学理论和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归纳和分析 19 世纪末在朝鲜刊行的“类解”类文献，从词汇的角度重点研究汉字词汇和朝鲜语汉字词的使用状况，调查个别汉字词的变化过程以及不同年代的汉字词的使用状况。该研究不仅有助于朝鲜语言词汇体系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汉语的词汇史研究。

郑日男的《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之关联研究》，考证了楚辞传到朝鲜的大致时间，简要介绍了朝鲜各个时期文人学者接受楚辞的基本情况，最后综合考察朝鲜古代文人的楚辞观、接受楚辞的基本动因等。其研究结果有助于客观地把握楚辞在朝鲜的传播、接受与转化特点，为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接受研究提供了另类事例，对于我国楚辞研究、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海外传播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李逢雨的《中国朝鲜族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建设》，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对中国朝鲜族新闻事业的历史变迁和发展状况进行了历史考察，论证了中国朝鲜族新闻出版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该成果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朝鲜文报刊杂志应该切实植入社会效益概念，

通过结构调整和资源重组的规模化经营，对各种读者市场的开发、培育以及差别化经营管理来发挥自己的特色。

“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不仅涵盖了朝鲜—韩国语言、文学、文化领域的研究，还包括了朝鲜—韩国语言文化与中国、日本以及其他各国语言文学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能够取得重要成果，是延边大学的地缘、语言、文化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结果。

“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的出版目的在于，和国内外广大学者、教授、研究者等学界同仁一同交流这些研究成果，虚心接受批评，弥补我校的缺点，进一步突出我校的优势，从而形成我校自己的特点。再者，通过与学界同仁们的交流和研究，不断扩展视野、积累经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共同促进朝鲜—韩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

正如所见，“朝鲜—韩国学研究丛书”充分体现了延边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中朝鲜—韩国语言文学学科所取得的科研成果，这些成果将成为即将开始的延边大学“211工程”四期建设项目的坚实基础。

最后，向为这套丛书顺利出版提供支持的人民出版社以及相关同志表示深深谢意。

延边大学 蔡美花

2012年2月10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楚辞在朝鲜的传播	4
第二章 楚辞与三国、统一新罗文学	10
第三章 楚辞与高丽文学	15
第一节 楚辞与高丽前中期文人	15
一、楚辞与郑叙、林椿	15
二、楚辞与李奎报	19
第二节 楚辞与高丽后期文人	29
一、楚辞与李齐贤	29
二、楚辞与李穡	33
三、楚辞与郑梦周	45
第四章 楚辞与朝鲜朝文学	66
第一节 楚辞与朝鲜朝前期文人	66
一、楚辞与徐居正	67

二、楚辞与金时习	84
第二节 楚辞与朝鲜朝中期文人	92
一、楚辞与郑澈“恋主”诗	93
二、楚辞与申钦	122
三、楚辞与李植	140
四、楚辞与张维	161
五、楚辞与尹善道	179
第三节 楚辞与朝鲜朝后期文人	183
一、楚辞与李德懋	183
二、楚辞与朴齐家	203
三、楚辞与丁若镛	209
第五章 综合论	241
第一节 “值月夜，喜诵离骚经”	241
第二节 朝鲜古代文人的楚辞观	244
一、褒扬屈骚说	244
二、贬低屈骚说	246
三、楚辞承继《诗经》并为近体诗启后说	247
四、《离骚》“怨而不乱”或“怨而失中”说	248
五、屈平之怨是合情合理说	250
六、《离骚》等为悲奇之文说	251
七、《离骚》为托物寓意之文说	252

第三节 接受屈骚的诸形态	255
一、楚辞“作者”的接受	256
二、楚辞“恋主”的接受	257
三、楚辞“香草美人”意象的接受	258
四、楚辞其他意象的接受	259
第四节 接受楚辞之动因	262
第六章 结 语	270
参考文献	277
后 记	283

绪 论

楚辞的创始人屈原是中国古代先秦时期楚国的忠臣，也是整个中国乃至亚洲古代汉文化圈各国家和地区文人墨客心目中所崇敬的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峻洁纯美，“独立不迁”、“独清独醒”、“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格与忧君忧国的爱国情怀以及由他开创的楚辞文学，不仅对后世中国文人的思想性格及文学影响深远，而且对处于亚洲古代汉文化圈各国家和地区文人的思想与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影响。

位于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自统一新罗时期前的“三国”时代便已开始接受楚辞文化。此后，直至朝鲜朝末，受其影响或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文人举不胜举。且不论名气极大的大诗人，就连稍有名气的文人墨客亦是动辄结合自己的不幸遭遇与屈原同病相怜，谈及屈骚，吟咏楚辞。尤其是各个时期可代表朝鲜古代文学成就的著名文人无不对屈原推崇备至，其均被屈原的人格力量所感化、倾倒。至于《离骚》¹ 则更是被其视如瑰宝，爱不释手。例如诗人朴齐家，崇尚屈原至极，自号“楚亭”，且平时还常携带《离骚》，上演“扁舟无一物，鼓柁诵《离骚》”的动人一幕。可以说，哪里有士人怀才不遇或仕途坎坷以及贬谪之人，哪里就有屈原的英灵莅临，可听见吟唱《离骚》之声。屈原精神已经成为没有国界的、安慰和解脱古代文人墨客忧郁和苦闷的精神家园。

屈原的人格精神及其楚辞文化不仅对朝鲜古代作家的思想人格有着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朝鲜古代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朝鲜古代文人不但创作出很多受屈骚影响的汉诗、时调、歌词，还有不少“拟骚体”或受楚辞启

发而创作的作品。像郑澈的歌词“前后思美人曲”² 堪称是朝鲜的《离骚》。假如没有吸收楚辞的精华，很难想象其能够作出如此辉煌的艺术名篇。仅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楚辞对朝鲜古代文学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因此，深入地探讨楚辞对朝鲜文学的影响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迄今为止，与本书相关的课题研究，已经有所展开，并业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国内相关的研究中，吴绍钊的“屈原与韩国诗人金时习之比较”³，郑日男的“屈原与朝鲜古代诗歌”⁴ 等文章；以及在韩国相关研究中，金荣洙的“忠臣恋主之辞研究”⁵ 等论文，对朝鲜古代文人与楚辞之关联进行了较有深度的研究，并且这些论述也提到了与本书相关的部分观点。这为今后进一步全面阐述楚辞与朝鲜古代文学之关联、朝鲜文人接受楚辞的内在动因等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屈原及其楚辞文学主要以屈原卓越的人格力量和深沉悲壮的情怀以及《离骚》富有感染力的抒情和“香草美人”之象征手法，对朝鲜古代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接受这种文化精神的文人大都是人生失意之人。他们或是怀才不遇，或是仕途沉浮不定，或是发配到边陲的文人墨客。这些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文人，从不同的角度吸收了屈原精神和楚辞的精华来为我所用，为朝鲜古代“恋主”文学、“恨”之文学的开创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为此，要以历时地、全面系统地考察古代朝鲜文人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接受楚辞的基本现状，分析这些文人作品中楚辞的各种因素、楚辞的接受与转化特点、各自接受楚辞的动因是非常必要的。它将阐明朝鲜古代“恋主”文学、“恨”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及其特色，还将阐明两国间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因素，进一步探究屈原人格及其文学跨国、跨民族、历时魅力的所在皆有着重要意义。

朝鲜古代的“恋主”作品一般不着楚辞痕迹，它比较典型地体现着“影响是精神渗透”的特点；朝鲜古代文人在接受楚辞、理解楚辞的过程中，显示出同中有异、同中各具特色的特点，它符合重视读者理解文本的意识“先结构”理论，所以本书从为部分比较文学理论提供与西方不同依据的角度来说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本书将以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为主，兼用平行研究、接受研究等研究方法为辅，主要就以下内容进行阐述：第一章，楚辞在朝鲜的传播；第二章，楚辞

与三国、统一新罗文学；第三章，楚辞与高丽文学；第四章，楚辞与朝鲜朝文学；第五章，综合论。

注释：

1. 在朝鲜，作为楚辞代表的《离骚》既被看做是一篇作品，又被看做是代表着整个楚辞。

2. 此篇被誉为朝鲜“恋主”文学的典范之作。

3. 吴绍铤：《屈原与韩国诗人金时习之比较》，《东疆学刊》第3期，2003年7月。

4. 郑日男：《屈原与朝鲜古代诗歌》，金宽雄、金东勋主编：《中朝古代诗歌比较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5年5月版。

5. 金荣洙：《忠臣恋主之词考》，《渊民李家源先生七秩颂寿纪念论丛》，正音社1987年4月版。

第一章

楚辞在朝鲜的传播

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的源头。虽同为源头，但对后世产生的影响而言，楚辞比《诗经》更深刻，更久远。正如鲁迅所言：“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之上。”¹ 如此“言长”、“思幻”、“文丽”、“旨明”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楚辞，以其南方楚国文化特殊的美学特质，加之屈原本本人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人格及其不凡的才情，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²。

“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汉武帝之时。《汉书·朱买臣传》云：“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³ 这是如今可知最早提及“楚辞”的文献资料。可见，这时“楚辞”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与六经并列。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⁴ 由此“楚辞”一名，便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古代朝鲜文人大都也认为“楚辞”名称是由西汉刘向首先提及，韩国研究楚辞的当代学者亦认同这一观点。但是，刘向编撰的《楚辞》已失传，而流传至今的有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共 17 卷。据《四库全书》记载，楚辞当中属于屈原作品的有 24 篇，还有包括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7 篇）、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9 篇）、刘向（《九叹》9 篇）、王逸（《九思》9 篇）在内楚辞作品共有 64 篇。

但本书研究范围主要限于屈原作品对朝鲜古代文人的影响。因为屈骚之

后的辞赋大都为仿屈原之作，所以也属于受其屈骚影响而作的支脉性质的作品，而且从朝鲜文人接受楚辞的情形来看，大都与屈骚有关联。当然屈原的作品当中也存有一些是否是其本人创作的问题，需要澄清。

据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其认为屈原之作有《离骚》、《天问》、《招魂》、《九章》（9篇）、《九歌》（11篇）等23篇，这是中国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是王逸《楚辞章句》则认为包括《远游》、《卜居》、《渔父》在内的25篇均为屈原之作（《招魂》为宋玉所作）。朝鲜古代文人大都认同上述王逸的观点，并以此来接受楚辞，学习楚辞。加之韩国的一些当代学者也认为《远游》、《卜居》、《渔父》为屈原的作品。⁵ 其实中国的部分学者也把《远游》“似乎定论”为屈原之作。⁶

总之，我们可以相信朝鲜古代文人基本是以上述26篇为屈宋之作品来接受、学习、研究，并模拟写出类似作品的。所以，本书主要以《离骚》为主的26篇之影响为考究对象，来进行楚辞与朝鲜古代诗文的关联研究。

位于东亚的朝鲜半岛，从统一新罗⁷之前的三国⁸便开始接受楚辞文学。楚辞是随萧统的《文选》而传入朝鲜的。载有楚辞的《文选》到底何时传入朝鲜的具体时间还很难确定，但通过下面的一些资料可以推知楚辞传入朝鲜大概的时间段。

资料一

实兮，大舍纯德之子也。性刚直，不可屈以非义。真平王时（五十三年），为上舍人。……谪官冷林。或谓实兮曰：“……何不直言自辨？”实兮答曰：“昔，屈原孤直，为楚摈黜，李斯尽忠，为秦极刑。故知佞臣惑主，忠士被斥，古亦然也，何足悲乎？”遂不言而往，作长歌见意。⁹

资料二

父欲观其志，问曰：“尔学佛乎？学儒乎？”对曰：“愚闻之，佛世外教也。愚人见人，安用学佛为？愿学儒者之道。”父曰：“从尔所好。”遂就师读《孝经》、《曲礼》、《尔雅》、《文选》。所闻虽浅近，

而所得愈高远，魁然为一时之杰。遂入仕历官，为时闻人。¹⁰

资料三

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曄《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¹¹

资料一是新罗第26代真平王(在位，579—632)时期，有关名叫实兮的人被谗贬斥的事件。上舍人实兮，由于性情刚直，被贬谪到“冷林”，有人劝他自辩时，便抒发“屈原孤直”、“忠士被斥”自古如此的悲叹。资料二是新罗第29代武烈王(在位，654—661)时期，有关新罗著名的学者强首(?—692)早年所学习内容的记载。即强首父探明儿子的学习志向时，强首说，要学习《孝经》等儒家经典，里面包括载有楚辞的《文选》。资料三是中国史书有关高丽国教育方面的记录。“扃堂”是高句丽的民间教育机构，资料所列举的书籍，相当于当时民间教育机构的教科书，里面也包括《文选》。其时间相当于中国唐高祖(在位，618—626)时期。

这些资料表明，公元600年前后，也就是统一新罗以前的三国时期，楚辞已经传到了朝鲜半岛。这又说明，楚辞是在萧统(501—531)编纂《文选》约100年后传到朝鲜的。还有一点，即根据有关汉武帝(在位，前141—87)在朝鲜北方设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一事，也不能排除当时或稍后已接触包括楚辞在内的先秦文学的可能性。况且在中国，“楚辞”这个名称在汉文帝(在位，前179—157)时已经出现，武帝时楚辞文学的价值已被重视。¹²

尤其是“又有《文选》，尤爱重之”的表述的确说明当时朝鲜人特别喜欢欣赏包括楚辞在内的中国的诗文。《文选》在三国，特别是在新罗和高句丽成为教育青少年的必读书目，以及选拔朝廷官员的重要考试科目之一。下面的资料亦可证明这一点。

四年春，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

若《文选》而能通起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¹³

新罗第38代元成王4年(788)国家启用人才时按照读书多少来定上中下三品，其中读通《春秋左氏传》、《礼记》、《文选》，以及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品，而中品和下品则不包括《文选》等。当然，如果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越级破格提升。这里的诸子百家包含楚辞。这就更能说明选拔人才时《文选》的重要性

《文选》编撰之初为30卷，而唐代的《李善注本》、《王臣注本》、《六臣注本》刊印之后增加到60卷。其中，楚辞不过2卷。但是，对楚辞及其作者的评价在中国历来占很大的比重，朝鲜当然也不例外。估计当时楚辞在《文选》中备受重视，尤其是屈骚，虽然不难排除对君王的怨言，但是作为“忠臣恋主之词”或忧国忧民之作，应该是教育青少年最好的教科书，以及对臣民绝好的教养书。因此，笔者认为楚辞在当时很可能就是科举考试中的热门课程。

到高丽朝，《文选》更受到许多文人的青睐，以致出现“高丽文士，皆以诗骚为业”¹⁴的现象。对此，崔滋的《补闲集》也有说明：

文安公(愈升旦，1168—1232)常言，凡为国朝制作引用古事，于文则“六经”、“三史”，诗则《文选》、“李杜韩柳”。此外，诸家文集，不宜据引为用。¹⁵

可见“为国朝制作”诗歌时，只限于参考《文选》以及李白、杜甫等文人的作品。不言而喻，在当时包括楚辞在内的《文选》很受高丽文人的重视。

到了高丽中后期，提及屈骚的诗文就更多了。郑叙、林春、李奎报、李齐贤、郑梦周、李穡、吉再等文人及其作品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屈骚的影响。这些高丽文人墨客争相恐后地谈论“诗变为骚”，手口不离屈骚。高丽王朝矢志不渝的名人达士，更是尊崇屈原“独立不迁”的人格和忠贞不二的精神，把屈原人格当做精神支柱。

到了朝鲜朝，文人接受屈骚的深度和广度更进一步，屈骚文学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简直是空前绝后。不少文人把自己的怀才不遇与不幸联系到屈原的悲剧命运，通过诗歌抒发同病相怜之情，以美人香草之喻，表达忠臣恋主之情，以及灵活运用楚辞用语、诗句，使朝鲜文学更加绚丽多彩，更有特色。

这个时期，除了下面特设专节着重阐述的文人之外，还有曹伟、成侃、林梯、朴仁老、李安讷、李明汉、李真儒、金春泽、金笠等许多文人也通过汉诗、时调、歌辞、散文、小说等不同文学体裁表明对屈骚的关注。

总之，楚辞在三国时期传到朝鲜半岛之后，对整个古代朝鲜的诗歌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朝鲜朝中后期，不少同病相怜之文人墨客先后加入了所谓“逐臣文学集团”，从而为朝鲜古代文学增添了光彩，做出了贡献。

注释：

1.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屈原与宋玉》。
2.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129页。
3. 《汉书》卷六十四，《朱买臣传》。
4.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132页。
5. 范善筠：《屈原对韩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屈原文学论集》，新亚社2001年版，第195页。
6. 《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866页。
7. 指朝鲜“统一三国”的公元676年至“后三国”（892—936）开始的892年期间。
8. 指朝鲜4世纪初到7世纪中叶出现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时期。
9. 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四十八，《列传》第八，《实兮》。
10. 《三国史记》卷四十六，《列传》第六，《强首条》。
11. 《旧唐书》卷二一一，《列传·东夷·高丽》。